

火可能进一步烧至东南沿海，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将无立足之地。”从这个角度看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“以战止战”的生存策略，通过军事行动打破美国的战略威慑，为新生政权争取到宝贵的安全空间。

多边博弈的开端

抗美援朝虽以军事行动为核心，但背后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多边博弈。新中国在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、被西方孤立的背景下，通过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调”“亚非拉国家争取”“国际规则塑造”三条路径，开启了多边外交的初步探索，为后续万隆会议的突破与国际组织互动积累了经验。

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平等博弈。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，新中国并非被动接受苏联的话语主导，而是通过积极参与阵营国际组织（如世界和平理事会、经济互助委员会），争取平等话语权。例如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，中国将抗美援朝的“反侵略”立场转化为阵营内部的共识，通过宣传中国人民“保家卫国”的正义性，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与支持。

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

抗美援朝虽以军事行动为核心，但背后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多边博弈。

所原所长官力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，新中国外交重心向亚非拉的转移，并非始于 1955 年的万隆会议，而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埋下伏笔。“1954 年，朝鲜战争结束，国际关系开始走向缓和。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‘走出去’的外交方针，为后来万隆会议上争取多数支持奠定了基础。”

抗美援朝不仅是军事对抗，更是意识形态与外交立场的较量。当时的亚非拉国家多为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、半殖民地国家，对“霸权主义”“殖民压迫”有着天然的警惕。新中国在战争中展现的“反侵略”立场，与亚非拉国家的诉求形成共鸣。中国在战争中始终强调“抗美援朝是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政，而非反对朝鲜人民”，并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平台，向亚非国家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。1955 年万隆会议上，埃及、印度等国对中国的支持，正是源于对中国“反殖民、反霸权”立场的认同，而这一立场的形成，与抗美援朝的实践密不可分。

抗美援朝期间，新中国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，但通过塑造“和平规则”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。1953 年，中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提出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”的主张，首次倡导“谈判而非战争”的争端解决方式；同年，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，将抗美援朝中“反对侵略、尊重主权”的立场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。这一规则的提出，正如官力教授所言，“是新中国多边博弈的关键突破——它跳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，以‘和平共处’为核心，为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‘强权政治’的国际交往模式”。

后来万隆会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“十项原则”，正是这种规则塑造的延续，标志着新中国从“军事博弈”转向“规则博弈”，在多边舞台上逐步打破西方孤立。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，中国与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建交，形成“第二次建交高潮”，彻底打破了西方主导的“对华孤立圈”。